

# 《一千零一夜》中的东方形象与对他者的想象

林丰民\*

**内容提要:** 在《一千零一夜》中同属于东方的印度、中国和波斯的形象有很大的差异,中国人和印度人在这部作品中基本上呈现出正面的、美好的形象,而波斯人则常常被描述为负面的形象。造成这种差异的原因主要就在于阿拉伯人对印度、中国和波斯的集体想象的不同,而对各不相同东方民族的集体想象的不同又是跟阿拉伯人同这些民族的交往密切相关,与军事的征服、政治的交往、商业的往来和宗教的排他性等因素都有关系。

**关键词:** 《一千零一夜》 东方形象 他者 集体想象

作为阿拉伯民间文学的代表作,《一千零一夜》所蕴涵的学术研究价值是不言而喻的。尽管国内外学者已经从各个侧面对《一千零一夜》进行了既有广度又有深度的研究,但它仍然有许多东西有待我们去进行进一步的开掘与探究,尤其是随着新的理论出现,对经典作品的解读也就有了新的视角、新的方法、新的途径。比较文学形象学的出现,就为我们研究《一千零一夜》这样一部具有多种文化成分的作品提供了重新解读的新视角。

尽管有人研究过《一千零一夜》中的人物形象,但这种对人物形象的研究是从故事的情节出发,为发掘作品的主题而进行的分析,与比较文学意义上的形象研究有着截然不同的区别。<sup>①</sup>因为“比较文学意义上的形象学,并不对所有称之为‘形象’的东西普遍感兴趣,它所研究的是一国文学中对‘异国’形象的塑造或描述(*representation*)” (孟华 2)。本文将在这一理论基础上探讨《一千零一夜》对作为“他者”的中国、印度和波斯形象,借此分析阿拉伯人对异国/他者文化的接受或排斥,论述他们对他者的“集体想象”。

《一千零一夜》开篇就出现了东方的异国形象:“传说古时候在印度、中国的群岛上,有一个萨珊国。国王手下兵多将广,奴婢成群。他有两个儿子,都是英勇的骑士。大儿子比小儿子更加骁勇善战。他继承了王位,治国公正无私,深得民心,称山鲁亚尔王。弟弟叫沙赫宰曼,是波斯萨马尔罕的国王。兄弟二人在各自的王国里治国严明、公正,可谓清如水,明如镜。百姓们也都安居乐业,幸福无比。就这样,不知不觉过了二十年。……”(《天方夜谭》1)<sup>②</sup>这个以东方形象开篇的故事虽然是要引出王后淫乱和国王开始滥杀无辜妇女的故事,但文本中对于印度、中国和波斯形象的叙述却持一种景仰、赞赏的态度。然而,随着情节的推进,对东方的形象却产生了分野,对中国和印度形象的描绘大体上仍然保持在这样的善意

\* 林丰民,北京大学东方文学研究中心研究员,北京大学外国语学院副教授,主要从事阿拉伯文学研究。本文是教育部重大项目《东方国别文学比较研究》子课题《中国文学与阿拉伯文学比较研究》的阶段性成果。

的基调上,而对波斯形象的叙述却变成了负面的。

对印度形象的刻画虽然不多,但是基本上都是美好的印象。在《脚夫和三个女郎的故事》中,第二个流浪汉讲述的故事把印度的统治者称作“伟大的印度国王”,而且这个国王也是求知好学的,在听说波斯王室的“我”的博学多才以后,便派遣使者携带重礼来拜见,邀请“我”去印度讲学。在这个故事中出现的女郎则是“一位灿若明珠般美丽的姑娘,让谁见了都会忘却一切烦恼和不快”,她是“印度边疆乌木岛国王的女儿”,本来已经许配给堂兄,却在洞房花烛夜被妖魔杰尔杰里斯·伊本·伊卜里斯劫夺走,霸占了25年,其遭遇令人同情。在《渔夫的故事》中套讲了一个小故事,题为《诡计多端的大臣的故事》,这个故事也与印度形象有关。故事叙述大臣企图假借妖精之手加害于王子,而这妖精在最开始的时候是变成了一个受难哭泣的女郎,以印度公主的身份出现在王子的面前,故而并没有引起王子的疑心和戒惧。

对中国的形象也基本上是正面的。《阿拉丁和神灯》的故事就是以中国中部大城市的一个裁缝的儿子作为主角来讲述的,它“生动反映了古代阿拉伯人民对他们所向往的神秘美好的中国的印象”(刘守华245)。而《卡玛尔·宰曼和白都伦公主》中的白都伦的身份就是中国的公主,她的形象,她的父王的形象,还有她的国家的形象都是令人神往的:

……今晚我从中国的一个岛屿飞来。那里的岛屿和四周的大海全是一个名叫乌尤尔的国王的国土,他还是七座宫殿的主人。这个国王有一个女儿,世间没有谁比她长得更漂亮。她天生丽质、窈窕婀娜,真是一位绝代佳人。对她的美丽,我这张笨嘴是无法形容的。她的父亲是一位声名赫赫的国王,统率着庞大的军队,控制着辽阔的国土。他日夜征战,骁勇无比,威名远播,天下无敌。他对女儿宠爱极了,不惜为她横征暴敛,掠夺别国的财物为她修建七座宫殿。每座宫殿都有不同材料建成。第一座宫殿是水晶的,第二座是大理石的,第三座是纯铁的,第四座是宝石的,第五座是白银的,第六座是黄金的,第七座是珠玉的。宫殿内装饰豪华,摆设着金银器皿,以及一切为帝王享用的物品。国王让他的女儿在每个宫殿内居住一年,然后再转移到另一个宫殿居住。国王的女儿名叫白都伦。白都伦公主的美丽天下闻名,各国的国王都派人前来提亲。乌尤尔国王就婚姻之事与女儿商量……(《天方夜谭》279—280)

“白都伦”这个名字本身也寄寓着一种美好的情怀,在阿拉伯语中“白都伦”意为圆月,是一种美好的意象,不仅是因为圆圆的形状本身令人赏心悦目,更因为圆月的清辉给沙漠里的阿拉伯人带来夜晚的光亮和清爽,令人心旷神怡,因此,在命名和起外号的时候,阿拉伯人往往也把有着美丽的圆形脸庞的人称为“白都伦”。

与中国形象和印度形象不同,波斯形象在《一千零一夜》的叙述中则十有八九是负面的、反面的。波斯人出现在作品中常常是丑陋的、可笑的,甚至是凶恶的,而最为普遍的则是一些可以被称作套话的词汇——“拜火教徒”、“伪信者”和“卡菲尔”(异教徒)等——常常被用来指称波斯人。有学者指出,“套话是形象的一个最小单位,它浓缩了一定时间内一个民族对异国的‘总的看法’,因此,对套话的研究往往能以小见大,引发很有意义的结论来,它对整个社会集体想象的研究都具有参考价值”(孟华12)。被《一千零一夜》所广泛使用的“拜火教徒”和“异教徒”等套话的确浓缩了阿拉伯人在征服波斯以后在宗教层面上对于波斯民族的集体想象。我们看到阿拉伯人在这里是以伊斯兰教来衡量一个人、一个民族的“信仰正

确性”。在当时,乃至今日,阿拉伯人都把信奉伊斯兰教的人看作是最优秀的,而把信奉其它一神教的人视为仅次于穆斯林的上等人,而对多神崇拜的人和拜物教徒则贬为愚昧之人,至于无神论者在他们眼里则简直是无药可救,丧失了死后进天堂的机会。波斯人在阿拉伯人到来之前大多信奉祆教<sup>③</sup>,崇拜火和日月星辰,这是伊斯兰教所反对的。在《脚夫和三个女郎的故事》中,第一个女郎讲述了自己在一座空城的经历,尽管是空城,但仍然可以看出那里曾经有过的繁华,之所以变成一座空城,是由于那里的人们信仰不好,被苍天降下怨怒,把所有的人和牲畜都变成黑石头,只有暗中信仰了伊斯兰教的公主得以幸免。他们之所以遭遇如此大祸,就是因为他们信仰祆教,国王、王后“和城邦里所有的人都是祆教徒,不崇拜威力无比的安拉,却崇拜火。他们发誓的时候也是指火、光、影和旋转的天体发誓”(《天方夜谭》185—186)。他们不仅不听来自上天的警告,而且变本加厉,终致灭绝。对波斯人的类似描述在《一千零一夜》出现过很多次。

即便和宗教没有关系,波斯人出现在《一千零一夜》中也大都是不好的形象。在《乌木马的故事》中,波斯方士不仅形容丑陋,而且还被认为是一个善于撒谎的大骗子,以至于当王子来到关押方士的监狱时还被狱卒们嘲笑了一番。在《脚夫和三个女郎的故事》中,三个波斯流浪汉形象则显得很可笑,他们都被剃光了胡子,都瞎了一只眼。在古代阿拉伯人甚至现在的一些穆斯林看来,男人如果没有胡子那就不像男人。非男人的形象加上独眼龙的怪状,就显得很滑稽。第一个波斯流浪汉讲述自己由丢失王子的身份变成如此模样的故事,提到自己的堂兄弟变成漆黑的焦炭和一个同样像漆黑的焦炭一般的女郎躺在一起,却原来这两个男女是由于战乱才遭到如此下场,女郎其实就是流浪汉的堂妹,堂哥和堂妹互相爱恋,并且不顾父亲的阻拦,“鬼迷心窍,走火入魔”,躲进一个地下大厅,触犯了人伦大忌,结果遭到天遣,被天火焚烧而成焦炭。第二个波斯流浪汉的故事中,魔鬼变成了波斯人的模样,对美丽的姑娘极尽折磨之能事,也差点把流浪汉本人杀死。

我们在这里看到,同样是东方民族,但是印度、中国和波斯的形象却有着巨大的差异,甚至可以说是反差。这种形象的差异从形象学的角度来看,它体现了一种文化事实。法国学者巴柔指出:“形象因为是他者的形象,故而是一种文化事实;此外,我们说的也是文化的集体形象。它应该被当作一个客体、一个人类学实践来研究。它在象征世界中占有一席之地,且具有功能,我们在这里把这一象征世界称之为‘集体想象物’”(124)。由于阿拉伯人对于印度、中国和波斯的集体想象不同,所以,在《一千零一夜》中所出现的作为他者印度、他者中国和波斯的形象自然也就存在差异。

而他者的形象作为一种“集体想象物”,受到“自我”/“注视者”一方的基本立场的支配。巴柔很详细地把注视异族文化的基本态度做了概括。第一种认为异族文化现实具有绝对的优越性,从而让异族文化凌驾于本民族文化/本土文化之上。“这种优越性全部或部分地影响到异国文化。其结果是本土文化,注视者文化被这个作家或集团视作低劣的。对应于异国文化的正面增值,就是对本土文化的贬低”(孟华,《比较文学形象学》141)。但在《一千零一夜》成书的年代,恰逢阿拉伯帝国强盛的时代,阿拉伯人不太可能用这样的眼光去注视他者文化,即便在伊斯兰教建立以后的早期扩张过程中,阿拉伯人曾惊异于被征服地区相对发达的文明生活和先进文化,但由于总体上屡战屡胜的征服者心态,多多少少削弱了他们对被征服地区文明的景仰与向往,恐怕更谈不上巴柔所说的狂热。

第二种态度可以称之为憎恶,恰恰走向了第一种态度的反面,将异族文化视为低下的,

从而对其产生不屑之情,这种态度导致一种正面的增值,产生一种对本土文化的“幻象”。《一千零一夜》中波斯人的形象就是在这种憎恶态度的基础上产生的。在作为文化核心的宗教方面,阿拉伯人把波斯的拜火教等信仰统统视为愚昧的、低劣的。这种态度促使他们在描述波斯人形象的时候将其丑化、矮化甚至妖魔化。

第三种态度是友善的、交互的。异族文化进入到注视者的视野之中,被看作是正面的,与本国文化并驾齐驱、各有优点,可以相互交流、相互学习、相互借鉴。《一千零一夜》中对印度、中国基本上就是这种友善的态度。作品中所出现的中国人形象和印度形象基本上都是正面的。<sup>④</sup>

## 二

我们已经了解了阿拉伯人对于东方其它国家形象的差异源于他们对这些国家/民族的态度不同,即对于各民族的想法不同。那么,究竟是什么原因造成了这些不同的态度呢?

《一千零一夜》中对印度形象的善意态度与阿拉伯早期征服印度的经历有关。在阿拉伯人征服了波斯以后,征服印度就有了一块极为便捷的跳板。公元636-637年就曾有了远征印度的第一次军事行动,在印度西海岸进行了掠夺性的军事冒险,公元712年,一支有计划、有预谋、有组织的阿拉伯远征军在大将穆罕默德·本·卡西姆(Muhammad Bin Qasim)<sup>⑤</sup>的率领下,再次远征,并攻占了信德的大部地区。但是,阿拉伯人对印度的征服是有限的。即便是阿拉伯人对信德的征服,也只是“印度历史和伊斯兰教历史中的一个插曲,一次徒劳无功的胜利”(辛哈班纳吉180)。他们亦曾试图以信德作为征服印度的基地,派遣军队去攻打其它各地的印度王公们,但均无功而返。这种有限的征服使阿拉伯人认识到印度的强大,同时又对印度文化有了直接的接触。阿拉伯人试图让被征服的印度人接受伊斯兰教和伊斯兰文化,但是当时也只有一部分信德的居民改变了信仰,这个国家的语言、艺术、传统和习俗仍然延续如旧,相反地,阿拉伯人却从这里建立起一个接受印度文化影响的窗口。“印度的音乐、绘画、医学和哲学在伊斯兰容易感受的青年时代中,给了它不少教益”(辛哈班纳吉181)。中世纪印度和伊斯兰世界的交往使阿拉伯人对印度有了深层的了解。自12世纪以来,大量著名的诗人、学者、苏菲派信徒和神学家一直移居印度,但在中世纪整个伊斯兰世界十分出名的印度穆斯林学者也决非少数,因此印度的许多观念对印度之外同时代的思想具有重大影响。

苏菲派与印度瑜伽的亲近,可能也是阿拉伯人对印度产生好感的一个重要因素。13世纪至15世纪一直统治着印度民间的宗教生活和伦理生活的瑜伽哲学在11世纪的时候就已经与伊斯兰世界的苏菲教徒有所交流,有所接触。苏菲派信众在接触了瑜伽之后,发现瑜伽派对于“终极实在”的理解与苏菲诗人们所表达的“神的同一性”思想颇为接近。一部题为《甘露壶》的诃陀瑜伽派论著曾对苏菲派知识界产生了巨大的影响,“该书曾数次被译成阿拉伯文和波斯文,把他们的冥想之教给苏菲派信徒,并传授有关药草和化学的知识”(里兹维426)。据说苏菲派布道用书还特别说明,瑜伽派在巴巴·法里德的修道处和各城镇的契斯提修道处中,都是受欢迎的贵宾。这种良好的宗教文化的交往,使得阿拉伯人对印度的认识保持着一种好感。双方的这种宗教文化交往的时间也正好是《一千零一夜》扩充、发展的时期,必然会影响创作者对印度形象的塑造。

还有一个原因大概也是站得住脚的,即《一千零一夜》的源头来自印度。尽管大多数的

学者已经取得共识,认为《一千零一夜》主要译自波斯巴列维文的《赫扎尔·艾福萨那》(意为“一千个故事”),但也有学者认为它的来源不仅限于此,而要追溯到印度去。翻译《一千零一夜》的著名译者纳训先生指出:“《一千零一夜》的原型是一本波斯故事集,叫做《赫扎尔-艾福萨那》,这本故事集可能最初来自印度,由梵文译成波斯文,再由波斯文译成阿拉伯文”(1)。研究《一千零一夜》的专家鄧溥浩先生亦认同这种说法,他在自己的专著中通过对《一千零一夜》中印度故事的早期痕迹进行分析,“推断《赫扎尔-艾福萨那》最早可能是一部印度故事集,后来加入了波斯的成分”(15)。英国的东方学家也做过类似的推测,对阿拉伯文学颇有研究的基布认为“山鲁佐德和敦亚佐德的基本故事可以上溯到印度”(基布 158)。如果这种推测成立的话,那么我们不难理解,印度人自己编的故事自然会有倾向于展示自身美好的一面。而阿拉伯人后来对印度所产生的好感促使他们在讲述《一千零一夜》的过程中保留了原来故事中对印度自身美好形象的展示。

对中国友善的想象一个最重要的原因也是征服未果所带来的对中国的认识。阿拉伯人对中国也不是没有过野心,但是阿拉伯人在征服伊朗以后向东推进的远征困难很大,在与中国交界的地方停止下来。这种结果使阿拉伯人认识到中国是强大的。此外,陆上丝绸之路和海上丝绸之路使阿拉伯人了解到的是中国物产的丰富,经济的发达,久而久之,形成了阿拉伯人对中国印象不错的集体想象。

《比较文学形象学》对中国的美好想象还得益于先知穆罕默德的圣训,曰:“学问即使远在中国,亦当求之”。这句圣训虽然是先知穆罕默德要求伊斯兰教信徒必须富于求知的精神,但我们也可以解读出其中所蕴涵的信息,即中国是一个有学问的国度。显然,阿拉伯人在很久远的年代就已经对中国产生了良好的印象,这种印象通过先知穆罕默德得到了强化,影响了后来的阿拉伯人对中国的认识。从《一千零一夜》中我们可以看到这种影响的痕迹。在《赛义夫·穆鲁克和白迪娅·杰玛尔的故事》中,赛义夫·穆鲁克王子从父亲赠送的礼物包裹上看到上面绣着的一个美丽女子的画像以后,当即迷上了这个姑娘,然而这个姑娘是居住在天国巴比伦城举世无双的伊拉姆·本·阿德花园。赛义夫·穆鲁克王子非此女不娶,老国王只好多方设法,召集群臣商议,但是谁也不知道如何能够找到这美丽的女子,只有一个大臣向国王献策:“伟大的陛下,要知道这个地方在哪里,不妨去中国,那是一个很大的国家,也许有人会知道”(《天方夜谭》729)。这话简直就是对先知圣训的一个极佳的注释,是对先知圣训的实践。

追溯阿拉伯人对中国和印度美好形象的原因,除了上述所说的征服未果的因素以外,还有两个方面值得注意,一是从古代政治和外交的原则出发,一般都会采取远交近攻的策略,相对于波斯来说,中国和印度当然要远得多,自然也就是要“交”的对象,而“交”的基础和前提条件是友好的态度,所以,从一开始阿拉伯人就已经预设了友谊的中国,或许还有友谊的印度。二是从美学的原则出发,一般认为“距离产生美感”,“美,最广义的审美价值,没有距离的间隔就不可能成立”(杨辛 甘霖 278)。远隔万水千山的中国和印度由于距离的拉开而产生了一种朦胧的美。而波斯人不幸就在阿拉伯人的近侧,一看就一目了然,有什么缺点也因为距离的靠近而被放大。

当然,产生波斯负面形象的最重要原因恐怕还是因为阿拉伯人的征服。“阿拉伯人入侵伊朗及其在伊朗的统治,是伊朗历史上影响深远的重大事件”(张鸿年 16)。公元 637 年,阿拉伯大军攻陷波斯人的首都泰西封,萨珊王朝的末代国王向东逃逸,于 651 年在木鹿附近被

杀,宣告了萨珊王朝的灭亡。从此以后,波斯丧失了作为一个独立大国的地位,沦为阿拉伯帝国的一个行省。阿拉伯人在波斯以征服者和占领者的姿态出现,高高在上,不可一世。据记载,一个骑马的波斯人如果迎头碰上一个步行的阿拉伯人,他必须立刻下马,把坐骑让给阿拉伯人。波斯人在当时的社会地位之低下由此可知。试想在这样的情况下,阿拉伯人对被征服的波斯人能有一个好的印象吗?

伴随着军事征服的是更厉害的宗教的和思想意识的征服。很多波斯人被强迫放弃原来的宗教信仰,而改奉伊斯兰教,否则,要么被杀头,要么缴纳人头税,除此以外,别无选择。在这种政策的诱导和胁迫下,波斯人逐渐改变了自己的信仰。“在思想意识方面,伊朗人的宗教信仰发生了深刻的变化,越来越多的人由信奉琐罗亚斯德教转而信仰伊斯兰教。一个民族宗教信仰的改变乃是这一民族人民心灵深处的变化。这一变化一方面必然经过曲折困难的过程,另一方面也必然给以后世代社会、经济、政治及文化带来深远的影响”(张鸿年 17)。这使得波斯民族整体上越发受到阿拉伯人的蔑视。阿拉伯人首先认为波斯以琐罗亚斯德教为主的宗教信仰是与伊斯兰教背道而驰的,他们对火的崇拜而不是对真主的崇拜是难以容忍的,因此,要想方设法迫使波斯人改信伊斯兰教。而当波斯人因为各种原因放弃了自己原先的宗教信仰以后,又从人格上被阿拉伯人瞧不起。

阿拔斯朝(公元 750—1258 年)建立初期,有很多波斯人在阿拔斯政府担任各种职务,有的甚至位高权重,严重威胁到哈里发的地位,如伯尔麦克家族,几乎成了哈里发的“太上皇”,但终于还是被哈里发哈伦·拉希达借机收拾了。<sup>①</sup>波斯人在政治上彻底丧失了地位。在文化上,在阿拔斯朝时期曾一度兴起了“舒欧比”思潮,极力抬高波斯的文化地位,颂扬波斯的文化成就,同时大力贬低阿拉伯的智慧和阿拉伯文化,但是这时的阿拉伯人具有强大的同化能力,从被征服的各个民族学习了很多东西,使得阿拔斯朝文化成为一种以伊斯兰文化为核心的包含了各个民族的国际性文化,从而压制了波斯人的文化优越感。而这个时期也正是《一千零一夜》在阿拉伯开始热起来的时候。我们看到《一千零一夜》中很多有关巴格达城市和哈里发哈伦·拉希德的故事就是在这个时代的背景下产生的。

如此,我们不难理解阿拉伯人对于波斯这个“他者”民族的集体想象是负面的而少有正面的。

总的看来,《一千零一夜》中所塑造的东方形象是他者的形象。他者中国、他者印度和他者波斯的形象之间存在着巨大的差异。这种差异是由于阿拉伯人对异族的中国、印度和波斯不同的想象,和不同的文化态度。他们在长期的过程中对各个东方国家的了解与交往决定了他们对中国和印度的善意与友情,也决定了他们对波斯居高临下的姿态。

### 注解【Notes】

① 即便在普通意义上的形象研究方面,国内已有的研究成果也不是很多,仅有纪焕祯发表过一篇《山鲁佐德的现代文学形象》与形象有关。但这篇文章也不是对《一千零一夜》人物形象的具体分析,而是总结了《一千零一夜》人物在现代文学中的重新演绎。鄧溥浩的专著《神话与现实——〈一千零一夜〉论》中有一章论述《一千零一夜》的民间故事母题,在一定程度上与人物形象相关。

② 参阅《天方夜谭》,鄧溥浩等译(漓江出版社,1998年)1。本文所引用自《一千零一夜》的内容均出自此译本,同时参考纳训翻译的6卷本。原文参考埃及开罗现代阿拉伯研究中心(Al-markaz Al-'arabi Al-

hadith)整理印行的文本。

③ 即锁罗亚斯德教,又称拜火教。

④ 巴柔认为还有第四种态度,“也是最后一种态度:交流、对话的现象消失了,以让位于一个新的正在统一起来的整体。在试图重建已失去的联盟或制定新体系的运动中这一现象尤为明显:如泛拉丁主义、泛日耳曼主义、泛斯拉夫主义;同样也表现在各式各样的世界主义、国际主义中。人们把大量交流作为原则提出来,但仅限于在一个有序的内部。18和19世纪,许多法国文人信奉的世界主义都是有前提的,即在这个分为等级的世界里有一个中心,而此中心就是巴黎。……”(见孟华主编:《比较文学形象学》,第143页。)但是笔者认为基本的态度就是前面的三种。

⑤《印度通史》的中文译者从英文翻译过来的译名为穆罕默德·本因·昆西姆。

⑥ See Philip K. Hitti, *History of The Arabs*, 10th ed. (London: MacMillan; New York: St. Martin's 1970) 294—296.

### 引用作品【works cited】

达尼埃尔·亨利·巴柔:“从文化形象到集体想象物”,《比较文学形象学》,孟华主编。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0年。118—52。

[Barou, D. H. "From Cultural Image to Collective Imagination." *Imagology of Comparative Literature*. Ed. Meng Hua. Beijing: Peking University Press, 2000. 118—152.]

汉密尔顿·阿·基布:《阿拉伯文学简史》,陆孝修译。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76年。

[Gibb, H. A. *A Brief History of Arabic Literature*. Trans. Lu Xiaoxiu. Beijing: People's Literature Publishing House, 1976.]

刘守华:《比较故事学论考》。哈尔滨:黑龙江人民出版社,2003年。

[Liu Shouhua. *A Survey of Comparative Studies of Stories*. Haerbing: Heilongjiang People's Publishing House, 2003.]

孟华主编:《比较文学形象学》。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0年。

[Meng Hua. *Imagology of Comparative Literature*. Beijing: Peking University Press, 2000.]

——:“比较文学形象学论文翻译、研究札记”,《比较文学形象学》,孟华主编。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0年。1—16。

[---. "Notes on Translation and Studies of Imagology of Comparative Literature." *Imagology of Comparative Literature*. Ed. Meng Hua. Beijing: Peking University Press, 2000. 1—16.]

纳训:前言。《一千零一夜》,纳训译。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57年。

[Na Xun. *Preface*. *The Arabian Nights*. Trans. Na Xun. Beijing: People's Literature Publishing House, 1957.]

辛哈·班纳吉:《印度通史》,张若达·冯金辛·王伟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64年。

[Sinha, Narendra Krishina, and Chaandra Banerjee. *History of India*. Trans. Zhang Ruoda, Feng Jinxin, and Wang Wei. Beijing: The Commercial Press, 1964.]

杨辛·甘霖:《美学原理新编》。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6年。

[Yang Xin and Gan Lin. *A New Edition of Esthetic Theory*. Beijing: Peking University Press, 1996.]

张鸿年:《波斯文学史》。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3年版。

[Zhang Hongnian. *History of Persian Literature*. Beijing: Peking University Press, 1993.]

邱溥浩:《神话与现实——〈一千零一夜〉论》。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7年。

[Zhi Puhao. *Myth and Realism: A Study on The Arabian Nights*. Beijing: China Social Sciences Press, 1977.]

责任编辑:杨建

Itosei, and it differs even more greatly from the style of Horitauo. However, it is very similar to the style of Yu Dafu's novels. The apparent borrowing in his masterpiece of *Beyond the City Wall*, from Yu Dafu's *In the Past* is apparent. It helps explain how the novels of people's private life of Oda Takeo came into being, and proves the existing interactions between the Chinese and Japanese literature.

**Key words:** novels of people's private life modern Chinese literature Yu Dafu's novels comparison

**Author:** **Qiu ling** is professor of English at the Foreign Languages Institute, Fujian Normal University. He has translated more than 10 books including *The Origin of Snow in Hokuetsu* and *A Collection of Japanese Literature or Art*. He is also author of more than 60 literary commentaries including *The Three Phases in Yu Dafu's Novel Writing Development* and *The Lessons Drawn from Historical Account of Xiang Yu's Biography in Taiheiki*.

**Title:** One Kind of Narrative Pattern and Cultural Expression in Western Literature

**Abstract:** Revenge is a universal historical-cultural phenomenon in that it is a realization of natural laws in human society through uncommon and extreme ways. In the narratives of the western culture, revenge-oriented texts has been representations of eternal significance and special values. The thesis classifies these revenge motives into three patterns. Then it gives them a cultural-philosophical reading, pointing out the aesthetic effect of their "tragic character" and historical value in literary studies.

**Key words:** revenge narratives tragic character historical value cultural interpretation

**Author :** **Yang Jing-jian** is professor of Contemporary Chinese Literature in College of Liberal Arts, Hunan Normal University.

**Title:** Eastern Images and Imagination of the Other in *Arabian Nights*

**Abstract:** We find differences among the figures of oriental countries such as India, China and Persian in *Arabian Nights*. Chinese and Indians were often described as good and kind, but the Persians were always described as bad and wicked. This representation reflects the Arabian's collective images of Indian, Chinese and Persian. It also implies religious prejudice and leads to military conquest.

**Key words:** *Arabian Nights* eastern figures the other collective imagination

**Author:** **Lin Fengmin** is associate professor at the Research Center of the Eastern Literatures Study of Peking University.

**Title:** Kawabata Yasunari's Depiction of the Other Reality

**Abstract:** Kawabata Yasunari's postwar works, especially his "intermediate novels", are not short of social themes as being accused of by some critics. Facing the reality, he elaborately depicted the confusion, evil and sadness in his society. He showed that the war brought mental injury and shadow to people's life and love, and that people's ideal of magnificent prospects